

合作或其他阻止任何地點戰爭爆發之辦法。總之，這是根據於『無關我人』之假定。美人的注意並非阻止別處戰禍之爆發，而只在於避免加入戰爭。故美人不管其他中立國對於交戰國之政策如何。所以美國的政策是嚴格的國家的，並片面的。其運用亦未必能達到不牽入於戰爭之目的。

美國會所宣佈之政策雖欲為美國之永久的政策，但至多我人可說這是一個試驗。若謂這是代表國家之最終的判斷，當然是一個危險的推測。

## 一一二六

### 日本與中國在心理上之衝突

王成組

原名 "Japan and China: A War of Minds" 係茅頓 (Robert S.

Morton) 所著，載於美國太平洋時事雜誌 (Pacific Affairs) 十卷三號 (一九三

七年九月) 三〇五—三二四頁。

中日兩國，都有許多兆人，包括若干身居要職者在內，互相仇視，在心理上早已入於戰爭狀態。他們的這種態度，無論因果如何，是非如何，對於中日國交的不睦，大有關係。一個民族的思潮感情，雖則不是輕易所能估量報告，儘可以利用有意義的例證表明他的梗概。

從文化的立場看來，中國人總以為日本人是忘恩負義的後生小子。日本文化的構成，在文字學術法制禮儀美術工藝等種種方面，本來

都是從中國傳授過去。中國的普通見解，以為除去軍事的野心與暴行，日本就一無所長；他們的優點都是在過去得自中國，在現代得自西方。極少中國人能够體察到日本人對於外來文化的特殊改變與發展，以及新舊各種成分的融合。他們沒有能把自己同日本人，一律看做中國古代文化的繼承人，放在同時代的秤盤上來比較。

在日本方面，有許多人也承認中國曾經成為文化的領袖，但是在近代早已落伍。新進的中國人，在日本人看來，都是些爭權奪利的武人，播弄是非的宣傳員。中國的學校，徒然造就許多不中用、不知足的一知識階級，「成羣的第四等政客，喜歡帶有濃厚黨派色彩的激烈分子。中國人應付這一種批評，往往反對來攻擊日本式的教育，受政治作用的支配，只能產生奴隸性的軍國民。偌大的帝國，竟不敢讓人民自由研究各種社會科學，而且嚴格限制高等以及中等教育，使得無產階級的民衆絕對屈服。

其次關於國民性的分析，雙方也是各執己見。日本人多半很自負本國的地方，從沒有被人征服過，他們的皇室據說是一脈相承。根據中國歷朝的更代，以及受異族的入侵，他們就以爲中國人向來不善於自己整飭紀綱。由於生存競爭的劇烈，中國人都急於謀自身、家族、黨派、鄉邦的利益，而不能爲國家合作。革命以來，但靠國民黨的排外政策號召統一，於是結晶而成排日政策。中國受到西方的影響，比較日本還早，可惜缺少團結的意志來利用機會，一味沿襲以夷制夷的手段，自己既不

能受到利益，又不能抵禦西方的壓迫。

在中國人看來，日本的國民性是犯着不可救藥的愛國狂。他們的所謂忠誠，只是盲目的服從天皇，而他的大權竟會經落在好大喜功的軍閥的手裏。日本流傳的古代史的神話，無非是為麻醉人民。在近幾百年內侵擾中國沿海的倭寇，與現今橫行無忌的浪人、毒販、私商，以及到鄰國境內自認為主人翁的水陸軍人與警吏，都是「尊重法紀」的好代表。

無論那一國，只有極少數人，能夠感覺到對方也有家世修養都相同的人物。受一點教育的中國人，往往知道明治天皇或是伊藤博文，此外所熟悉的，就是同二十一條，滿洲事件，淞滬戰事等相關的人物。日本的企業家、著作家、美術家、發明家，沒有一個能在中國著有聲望。同時日本人對於中國古代的學者、美術家，或是少數帝王，都還熟悉。關於近人，除去李鴻章、西太后、袁世凱、孫中山，也就知道些當時佔勢力的軍閥。

甚至通常認為平淡而呆板的經濟事實，也難免受感情的支配而形成互相爭持的見解。日本把中國看做她的禁樹，對於中國自身的利害置之度外。日本輿論以為中國並沒有能切實改良她的特殊工業——例如絲、茶、陶瓷，至於農林、礦產、漁業、航業等，更不必說。他們對於中國人的不肯讓外人利用中國各種資源一方面又想限制日本工業的廉價貨品的傾銷，非常之仇恨。他們只記得奉票那一類的擾亂金融的惡習，而極少注意到中國新近在銀行幣制各方面的大進步，但知道

有積欠的債券，而忽視中國在外債信用與財政自給方面的改善。因此他們自以為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越俎代庖。

在中國人方面，並不能同情於日本所感受的經濟困難，因為日本總是藉口於那些難處來掠奪中國的並不富裕而切身需要的若干資源。從日本移植到她所霸佔的區域的人數，寥寥無幾，可見日本並不是真正需要殖民地。台灣、朝鮮的進步，無非是用侵略手段來壓榨居民。日本在中國的經濟活動，純乎是憑藉由恐嚇得來的特權；所謂「經濟合作」只是一種欺詐的手段。日本所認為妨礙日貨貿易的中國關稅，不是政府收入的大宗，而且是培植本國幼稚工業所不可少。

關於目前含有政治色彩的問題，心理上的衝突當然更其嚴重。中國人眼看著日本疆域的擴大，由琉球、台灣、朝鮮、滿洲、熱河、冀東、察北，以至於綏遠，都是從中國割去。這樣的推動要到什麼地方才停止？中國排着命同更強的武力抵抗，只是為自衛，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排外的心理不免過分，而在外國人之中最危險的日本人，當然最受仇恨。偏偏在日本人方面，凡是他們已經侵佔到的地方，都認為帝國的一部份，必須保護擴充。為辯護起見，他們總是推托中國治理台灣、朝鮮、滿洲等處如何腐敗，應當由更能幹的權力接管。同時他們以為所有大陸上的地方，都是由於日本打敗俄國而到手，否則中國也早已送給俄國。中國阻止日本的前進政策，日本以為是存心為他們所敵視的英、美、俄各國出力，妨礙日本現有以及將來的一切權益。帶着一點蘇俄的共產主義，尤其

足以引起日本的許多疑慮。

由國民黨組織的國民政府，許多中國人都以為過於遷就日本，遇事退讓。日本人卻以為國民黨最是可恨，因為他們主張繼續不斷的革命，攻擊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侵略，崇拜聯絡共產黨的孫中山，號召統一救國。在以往十五年之中，對於激烈的思想、刊物與組織，中國較為公開，日本深致不滿；對於近八年來約束的成績，並不承認。中國的容許外蒙以及新疆的大部分受蘇俄支配，而拒絕聯日抗俄，尤其是日本所認為忍無可忍。所以他們不惜以武力強迫中國成為日本資本家與軍閥共同經營的穩固生產勢力的一分子。其實大多數中國人，都很反對共產，無論是本國的或是俄國的，不過感覺到蘇俄的危險性，現在不及日本。同時有許多人的左傾，單是因為共產黨比較政府更彰明昭著的反對日本。所以日本的壓迫中國清除共產黨，正是使得左派的勢力日益加厚。

對於中國政府的地位，雙方見解也很不同。由於中國以往的內亂，日本總以為現在不過是又一武人，靠着國民黨的擺佈，暫時得勢；他們並不承認這一個政府建設的成績。多數中國人，見到政府安然渡過若干危險的難關，不免過於自信「統一」「復興」的實現。這樣的輕敵或自信，都含有危險性。

從以上的各方面，我們總可以看到中日兩方的見地，處處大有出入。日本對於中國，應當認清現實的情形，而改變他們的政策。中國對於

日本，也應當注意到眼前的行動的背景，探求一種長久適用的國交原則。新聞事業尤其要求毅然以糾正輿論自任。

## 一二七

### 工黨之地位與希望

金亞伯

原名 "The Position and Prospects of the Labour Party" 係 A.

L. Boyse 所著，載於一九三七年九月份之十九世紀月報內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Vol. CXXII, No. 727)

內政上任何事件之轉移，全視歐局之如何變易而定；工黨將來之地位與希望，亦無獨不然。若歐洲局勢，險惡如故，則各政黨之陣容，殊難有驚人之變更。國外人士，業已洞鑒之矣。當作者於今春游義時，曾獲誦論及英國內政一文，係著名法西斯蒂青年作家所著，載於恩尼·帕斯 (Omnibus) 週刊上。渠謂英之政權仍操於保守黨之手，且於數年中將繼續執掌，故義大利對英之保守黨應善為計及之。即德之國社黨亦取同樣之態度。

由此可見，倘歐洲局勢，依然不變；外來危機，依然凶惡，則工黨之地位，殊難恢復，改進之希望，亦甚渺茫。本年工黨「補缺競選」之失敗及票數之銳減，蓋亦因斯故也。若於此時，舉行大選，恐最後勝負，仍將操諸政府，雖其所獲議席雖不至過少，當不如一九三五年之多矣。

考其原因，實由於大多數國民之恐懼心理與夫保守黨之善於的